积极自我观的多维性与功能复杂性：来自数据驱动方法的证据

**1.理论起点：**

（1）概念厘清：

**在本研究中，积极自我观（positive self-view / positive self-cognition）指个体在自我相关的认知与评价过程中，倾向于以正向方式理解、加工、记忆和评估自我。积极自我观被界定为一个多层次的心理构念，既包括个体对自身价值的总体性评价（显性层面，如自尊），也包括支撑这一评价的认知加工过程（过程性层面，如在自我参照编码或隐性测验中表现出的自我-积极偏向）。前者通常通过自陈量表加以测量，例如罗森伯格自尊量表（Rosenberg Self-Esteem Scale, RSES; Rosenberg, 1965），评估个体在整体上对自我价值与满意度的态度；后者则可通过实验任务捕捉，例如自我参照编码任务（Self-Referent Encoding Task, SRET; Rogers, Kuiper, & Kirker, 1977）揭示自我相关信息在记忆加工中的优势，或隐性联结测验（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, IAT; Greenwald, McGhee, & Schwartz, 1998）用于检测自我与积极属性之间的自动联结强度。**

**将积极自我观界定为多方法、多层次的框架，有助于整合问卷与任务层面的证据，并厘清其与相关概念（如自尊、自我概念、自我增强、自恋）的异同。**

（2）积极自我观与相关构念的关系：**关于积极自我认知。既有研究多从不同角度界定这一构念：例如，自尊（self-esteem）强调个体对自我整体价值的态度评价（Rosenberg, 1965），自我效能感（self-efficacy）突出对完成特定任务的信念（Bandura, 1997），自我增强（self-enhancement）则强调个体在认知偏差层面对自我持有的积极性与美化倾向（Dufner, Gebauer, Sedikides, & Denissen, 2019）。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积极自我认知的重要性，但也导致了构念在操作化上的碎片化：不同工具开发者往往认为自己的测量反映了独立的心理变量。**

**这种概念碎片化在实证研究中引发了困境：一方面，不同量表和任务（如自尊问卷、SRET、IAT）在统计学上往往高度相关，提示它们可能存在共同的心理基础；另一方面，它们又展现出各自独立的维度性（如能力与道德领域的区分），难以完全被单一因子所统摄（Campbell & O’Mara, 2010）。因此，目前尚不清楚：积极自我认知究竟是一个由单一潜在因子驱动的整体构念，还是一个由若干相互交叉但保有独立性的子构念共同组成的“族群式构念”（family resemblance construct）。这一问题不仅关乎理论上的概念整合，也直接关系到测量学上的操作化方式。**

（3）功能分歧：部分研究表明积极自我观与更高的幸福感、更低的抑郁和焦虑显著相关，呈现长期的保护效应；也有研究发现，不同维度在特定群体或情境下预测效力有限，甚至可能带来负面影响。因此，积极自我观的预测功能可能并非线性、单向，而是存在复杂性与个体差异。

（4）研究缺口：目前研究多依赖单一自我报告，难以捕捉维度间的差异及其动态关系；对积极自我观如何在不同维度上作用于心理健康、以及与自我增强的关系，仍缺乏系统、数据驱动的检验。

**2. 数据探索：**

（1）多源测量：自我报告与行为任务，避免单一测量偏差。

（2）结构探索：相关分析、网络分析、双因子模型，检验条目之间是否聚合成多个维度。

（3）功能分析：自动机器学习，具体看不同维度的预测功能是否存在差异。

**3. 模型建构:**

（1）自动机器学习（AutoML）：利用数据驱动方法识别高噪音条目、稳定维度。

（2）功能性分析：通过 SHAP 等指标，分析各条目/维度对心理健康预测的贡献。结果发现：部分维度稳定地正向预测心理健康（保护作用）；部分维度表现抑制或负向作用；个体差异显著，同一维度在不同样本中可能有截然不同的预测方向。

**4. 功能解释：**

（1）多维特性：积极自我观不是单一因子，而是由多个维度构成。

（2）非线性与个体差异：不同维度在预测心理健康时表现出促进/抑制甚至双向作用。